

山西文史资料

第七辑

11.37-41,
506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·····	梁航标 (1)
关于蒋阎冯中原混战的几段回忆·····	于镇河等 (15)
阎锡山战败逃亡记述·····	关民权 (25)
我所听到的阎逃大连的情况·····	曲子祥 (33)
阎冯倒蒋之战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·····	陶伯行 (38)
解放前山西处理日本战犯的一幕·····	郭 华 (42)
辛亥革命忻州知州成立新军的一些情况·····	王定南 (45)
西北制造厂西迁之后·····	日 新 (50)
阎锡山的一个官僚资本机构—— 太原绥靖公署会计处·····	贾乙和 (63)
阎锡山的“合作社”·····	张青樾 (77)
裴宝棠和上党地区打蛋厂·····	王家驹 (89)
长治市回民和他们经营的皮毛业·····	马 侠 (94)
潞安地区婚丧制度在辛亥革命前后 的变革·····	王家驹 (104)
忻县婚丧事概况·····	石作玺 (112)

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

梁 航 标

蒋（介石）阎（锡山）勾心斗角达二十二年之久，其间经过的事实，不知有多少。只因一九三一年以后，我已离开政界，蒋阎的矛盾，虽亦时有所闻，但非亲身参预，故不在我回忆范围之内。我现在所回忆的时期，是从一九二七年山西参加“北伐”起，至一九三一年我离开阎锡山止。在此期间之真实情况而为人所不知或知而不详者，谨就回忆所及，如实录出，以供史料研究者的参考。

（一）山西参加北伐的经过

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间，我由豫回晋后，阎锡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北洋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？问我在省外二年，对这个问题，看法如何？我说：“北洋系多年来只知争权夺位，互相倾轧，不但不知国家人民的利益，也不顾本系的存亡。唐生智驱逐湖南督办赵恒惕后，曾派代表请求吴佩孚予以认可。当时吴之参谋长蒋百里（唐是他的得意学生），主张迁就事实，令唐督湘，以固后方。而吴则坚不承认，声言一俟北方军事稍松，即派兵送赵回湘。唐不得已，才加入北伐军，而湘省乃脱离北洋系之范围。既而革命军北上，武汉告急，吴佩孚电请孙传芳派兵由闽攻粤，以救武汉。而孙不之顾，私谓人曰：俟吴失败后，我再溯江而上，亦未为迟。结果吴败退河南，而孙之东五省也动摇了。孙又

电张作霖求援，而张亦不之顾。直至孙失败后，微服进京，面陈利害，张才把直、鲁两省军队交孙组织联军，由津浦路反攻，但大势已去，为时已晚。现在北洋系的地盘，已退缩到黄河以北，而实力则只剩东北及直鲁两省之军队耳。张作霖又迫不及待地做起大元帅来。这分明是回光返照的现象，北洋系的命运，还能长久么？”当时赵戴文亦在座，他表示他的看法也是如此。后来在阎的公馆又讨论过几次，最后决定以“北方国民革命军”的名义主动参加蒋介石的“北伐”。乃于一九二七年六、七月间（日期不记得）在督署大堂前举行易帜典礼，同时发表文告，一面誓师，一面派赵丕廉等分赴宁汉取联系。

阎锡山虽然易帜誓师，但不积极出兵。因当时奉方在郑州以北沿京汉线驻有重兵，北伐军又停在豫南而不前进。阎若出兵，实有先被击败的危险。对于直、鲁联军在津浦路的真实情况，也不明了。阎乃派我代表他访问孙传芳等，以期了解一切，并缓和奉方的压迫。我遂先到济南与张宗昌（山东督办）略事周旋，即转车赴徐州，与孙传芳、褚玉璞（直隶督办）等盘桓两日。乃知孙等虽在宿县以南大败蒋介石，而联军内部同床异梦，问题实多。我完成任务后，回晋报告。当时阎对北伐军内部情形，似甚明了。他说，北伐军将要停顿一个时期，在此期间，我们要感受困难。果然没有几天，张作霖就逼迫山西取消青天白日旗，并派唐在礼（？）等所谓北洋系的四老者来晋，劝阎悬崖勒马，拥护张大元帅，否则恐发生战争云云。在此情况下，阎乃秘密部署队伍，准备沿太行山分几路出击。是时，适有以于珍为首的奉军检阅团由绥回京，路经大同，阎遂令驻大同晋军将全团人员扣解太原，并令各路晋军同时出击。至此所谓主动参加北伐，才完全实现。并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，取消“北方国民革命军”名义，由政府将晋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，即以阎锡山为总司令。从此以后，阎与第一集团军蒋介石、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三

人共负北伐之责。此为蒋阎发生关系之始。

（二）北伐胜利前后的蒋阎关系

山西出兵后，先胜后败，最后退守娘子关和雁门关。奉军日夜围攻，而北伐军迟迟不进。这时山西真有先被奉军消灭的危险，好在山西地形易守难攻，奉军才没有打进来。大约经过半年之后，蒋介石派方本仁（前江西督办）为他的代表，来晋取联系。方对阎说：“北伐军前进缓慢，原因固多，而军令不统一，实为主因。蒋先生之意，似应建议政府选派一人负“北伐”军事总责，以期统筹兼顾，调动迅速，不知阎先生以为然否？”阎闻言，已知其意，遂极力表示赞成，并主动电冯协商，由他们二人致电政府，表示愿意拥戴蒋介石为北伐军统帅，他们甘受指挥。国民政府乃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仍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。从此以后，蒋与阎冯遂成从属关系。蒋可以直接命令阎、冯，不再通过政府了。

一九二八年夏，奉军被击败，节节后退，张作霖亦有出关消息。蒋介石乃秘电阎锡山迅速挺进，克期占领平津，并发表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。当时，北伐军队除蒋、冯、阎的一、二、三集团军外，后来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，李济琛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。蒋所以令阎占领平津，据说是因为各国使馆均在北京，当此政权转移之际，驻军一杂，容易发生不良影响。按北伐军的位置，阎军距北京最近，所以决定把平津两市划归第三集团军占领，由阎负责卫戍。表面是如此说，而骨子里完全是对人关系，因卫戍平津，按当时各军条件说，只能在阎、冯二人中选择一人，而阎比较守法易与，尚无倒戈历史，所以被蒋选中。既而阎到北平后，各机关因首长随奉军逃跑，负责无人，完全停顿，急待派人接管，而阎的随从人员有限，乃电晋招致人员，星夜来平工作。不料接管后没有几天，战地政务委员会赶到北平，也

不调查了解，纷纷派人携带战委会文件，接收北平各机关，甚至对崇文门税务监督公署所属各税局，也想直接接收，以致造成混乱，影响税收，而阎调来之工作人员也纷纷失业。当时各方人士都很愤慨，说这是旧首都，不是战地，应该电请政府各部正式接管，不能允许战地政务委员会乱搞。阎内心虽甚不悦，但表面上坚决服从蒋而不与之较。出关追击奉军的任务，既不委任三集团军，也不委任二集团军，而将追击之责委之于四集团军，并发表白崇禧为总指挥，这分明是防止阎、冯势力伸展到关外，造成尾大不掉之局。所以北伐军一到平津，蒋与阎、冯的矛盾，就发生了。

（三）编遣会议的前后情形

北伐军到平津不久，蒋介石即召集各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北平开会（所谓五总司令会议），讨论善后问题。当时，东北四省和西南各省尚悬挂着五色旗，而蒋介石就把编遣军队的大题目拿出来了。一般人虽然认为为时太早，看得太易，然统一军权，节省军费，开荒生产，积极建设，这是治国大计，谁能不加以赞成呢？可惜各人心里，有他自己的打算，蒋介石想的是如何消灭或削弱各集团军。而各总司令想的是如何应付蒋介石，甚至进一步推倒蒋介石。所以编遣会议，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会议。人人说的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。延至一九二八年冬季，国民政府遂正式下令召开编遣会议于南京。这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第一个问题，是如何到南京参加会议？阎性多疑而胆小，当此心怀鬼胎、应命赴京之际，更是疑团横生。他认为坐火车经过各方面防区赴宁，是无安全可言的，那时又没有可乘的飞机，所以决定由津乘船绕沪赴宁。乃包定载重二千吨之新华轮一艘，携带马弁护兵及随员，如期出发。到宁后，轮船返沪。没有几天，即闻新华轮触礁沉没。

编遣会议闭幕后，因新华轮事故，以致阎回华北又无安全途径了。火车既不愿坐，轮船又有危险，究竟应采取什么办法，才能保证安全？最后决定：同时包两船，一船乘坐，一船随行，万一发生事故，马上可以援救。结果并未发生任何事故，总算平安回津。我因接受任务，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协商统一财政事宜，所以未随船北上。阎锡山在南京表示，对国家统一大业，极力赞助，不但军队愿受编遣，财政亦愿交还中央，由中央统收统支，派我留宁，就是要充分表达此意。宋子文初闻阎愿将晋冀察绥四省的收入，都交给中央，他很高兴，表示赞成。及协商几次后，他才发现统收统支，不是那么简单，万一收入拿不到或有所减少，则第三集团军的开支，如何支付？所以后来他打退堂鼓说，此事一时尚不能实行，我们暂时停止商量，等到实行时，再决定一切云云。我遂于一九二九年春节后乘火车返晋。

（四）反蒋与冯玉祥入晋

我到太原后，感到一切情况，与两月前有些不同。总部的招牌已经看不见了，而挂着另一个牌子，写的是：“第三集团军结束办事处”。阎已回河边他的家乡居住，这是表示离开总部，听候编遣之意。其实，太原距河边，只有一百公里左右，乘汽车前往，需时仅两三个钟头。次日我去河边复命，即被留在河边工作。这时各方代表，陆续来晋，有的是探听消息，有的是酝酿反蒋，其所代表的大半是各杂牌军队，所以关系不大。到三四月间，以鲍文樾为首的代表团由沈阳来到河边。这是一次较有影响的接触。据鲍文樾说，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，东北内部发生极大的矛盾，张学良几乎无法控制，直到常、杨（常荫槐、杨宇霆）被镇压后，情况才好转，然困难仍甚多。张学良说，他年青无知，对关内事，不知该如何应付，说阎是他的父执，请求阎指导他。这分明是表示反蒋，只是没有明言。而阎锡山也是意在言

外，不把题目点明。他说：“汉卿（张学良字）如有困难，我一定竭力相助。将来晋奉两方如有结合必要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。请告汉卿，可以放手做去”云云。鲍文樾等四五人在河边盘桓两日，然后双方心心相印而去。到了七八月间，张学良又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来晋。是时，冯玉祥已入晋，反蒋已成公开的课题。王树翰劝阎早定大计，并云：张学良不愿再受南京压迫，希望阎率领国人共同倒蒋。阎谓：“蒋介石消灭异己，独揽大权，实在使人不愿继续拥护他，但国家多少年来，混乱不堪，今幸有一线统一希望，若再将蒋推倒，则国家又不免陷入四分五裂。所以我再三考虑，对蒋本人，深感到拥之不足，倒之可惜。就是说，蒋之作风，殊不足以使人拥戴，而因倒他影响了国家的大好形势，又未免可惜。”阎又说：“现在下结论，为时尚早，且看各方情况如何，再作进一步决定。届时，我派交际处梁处长前往沈阳接头，希转达汉卿”等语。这就是张学良两次派人到晋怂恿反蒋的经过。

一九二九年春间，当蒋介石解决第四第五两集团军后，即将矛头指向冯玉祥。冯知不免，乃将军队集结在豫西，准备应战。一面电请阎锡山共同倒蒋。当时是，阎认为全面倒蒋，时机尚不成熟，然不能坐视冯被击败，陷自己于唇亡齿寒、孤立无援之悲境。乃电劝冯顾全大局，勿兴兵端。并说，他已决定将军队交给中央，辞职出国；希望冯亦采取同样措施，使蒋放手治国，云云。冯接电后，立即表示同意。阎乃劝冯离开军队，先来晋居住。到五、六月间，冯遂率领随从人员，由豫过河，暂驻于五台建安村。阎则煞有介事地派人赴津定船，准备出国。既而他本人亦到北平，积极结束平津卫戍事宜。这时蒋虽明知这是一出戏剧，但是也不能不上台参加。于是亦由宁赶到北平，诚恳地劝阎打消此意，共负艰巨。经过若干时日的周旋，阎才接受蒋之慰留而戏剧遂告闭幕。此后数月，时局形势竟变成：阎挟冯以自重，一面酝

酿倒蒋，蒋联阎以制冯，乘机消灭异己。冯玉祥入晋，本来是一为缓和蒋之进逼，二为劝阎立即倒蒋，今竟成了阎的附庸，反而使蒋、阎在表面上加强联系了，当然大不高兴。屡请回防，发动战事，单独倒蒋，而阎坚不允许。最后计划乘他带来的汽车冲出阎为他设的保卫线。阎闻之，乘夜间雷雨之际，派人将蒋村桥梁炸毁，建安到省的公路遂断。自此以后，阎、冯见面甚少，矛盾亦日益深化。

（五）唐生智通电反蒋和阎锡山拥蒋

一九二九年秋季，蒋介石消灭异己愈急，各方反蒋之声浪亦愈高，纷纷派代表到晋，劝阎领导国人，共同倒蒋。其中力量较大的，有前述之张学良（代表是王树翰）和刘镇华（代表是刘茂恩）、唐生智（代表姓名不记得了），还有已被解决的李宗仁、白崇禧（他们的代表是潘宜之）。而阎则一再以时机尚不成熟为词，往后推延。一般人不明他的真意，认为他是坐失良机，尤其是冯玉祥，大骂大闹，不可终日。其实，他所谓不成熟的含意，不是指倒蒋，而是指蒋倒后的善后问题。他估计他掌握二、三集团军，再加上总数号为二十万人的杂牌军队，就可以把蒋打到长江以南。而东北军一再表示愿意参加反蒋，蒋之内部亦有人来接头，所以他认为倒蒋问题不大。但蒋倒之后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前途真不堪设想。阎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些问题，直到冬季，仍无妥善办法。就在这时，唐生智迫不及待地领导蒋方一部分将领通电反蒋，迫其下野。当时反蒋重心，本在阎、冯，谁也没有想到蒋方将领先行发动。因此，蒋系内部颇形慌乱，何应钦首先沉着观变，态度不明。所以，各方认为只要阎、冯通电响应，蒋介石只有下野之一途了。蒋本人亦认为事已至此，进退只好取决于阎。乃致电请教，大意谓：“弟德薄能鲜，致有今日，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。”等语。唐生智通电之前，并未向阎取联系，阎如何

肯助唐倒蒋？所以立即复电，以戡乱自任。蒋得电后，精神大振，马上电阎部署讨伐。阎并亲率大军，进驻郑州。于是蒋方内部情况大变，何应钦亦积极主张用兵。而唐生智方面，则逐渐解体。所以始终未正式开火，唐生智就失败了。这就是拥蒋的唐生智却通电反蒋，而反蒋的阎锡山倒实行拥蒋的内幕。

（六）阎冯反蒋大战前夕

阎既助蒋灭唐，遂于一九三〇年元月间，由豫返晋。按情理说，既然助蒋平乱，就不应该再进行反蒋，但事实上，阎锡山并未停止反蒋，且较前更为积极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阎锡山认为历代统治者成功后，很少能保全他的同事和功臣。蒋平乱后，接近成功，自己就更危险了。所以只要能倒蒋，就一切在所不计了。这和我主张完全相反。我认为既助蒋灭唐，就不应再反蒋。一再建议，有时他也首肯，但隔上两天，他又变了。当时赵戴文、杨兆泰等在南京，南桂馨、崔廷献等在天津，在太原者，除军人外，只有贾景德、赵丕廉，而贾、赵二人，均一贯主张反蒋。所以我有孤掌难鸣之感。后来我发现徐永昌的主张，与我相同，我怂恿徐永昌向阎陈述。徐说他是军人，他不能说话，希望我设法多进言。我于是又彻底说过一次。我说：“容我再申述一次倒蒋的意见，这次我不涉及国家人民等问题，纯粹以您个人的利害为言。我觉得消灭唐生智力量以后，蒋方内部较前大为团结了，国内反蒋形势有所转变。从前的问题在蒋倒之后，现在连能否迫蒋下野也成了问题了。万一军事失败，将何以自处？即使幸而成功，其后果也不堪设想。这岂不是无论胜败，都无善果？若能趁此助蒋平乱之余，以最大诚意协助中央整编二三两集团军，然后助蒋为理。如能成功是您使他成功，国人自有公论。他如失败，继他而负国家之责者，尚有何人？到那时，您虽欲逃避，亦不可得，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？”良久，阎乃曰，“你说

交出军权后，蒋能容我么？”我说，“岂止能容，恐怕他还要尊为元老，更加敬重哩。古代统治者残杀功臣，是为其子孙计耳，他本人既能率领功臣，削平天下，他对功臣，自有驾驭之方，又何必加以杀戮呢？今蒋介石再不肖，亦不至于帝制自为，则杀戮同志，实无此必要。此乃古今相异之点，务请详加思考。”最后，阎表示首肯。他又说，过几天再研究吧。几天之后，阎突然说，他的精神有些异常，他心里感到烦躁，看见茶樽酒杯，就想把他摔掉。这情形，辛亥革命前，曾有过一次，直到起义后，才恢复正常等语。他这话，表明他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矛盾，就是继续反蒋，他也知道不会有好结果，中止反蒋，他在思想上又搞不通。又过了两天，阎说：“中止反蒋，对各方面牵掣甚多，冯先生（玉祥）昨日派人来说，反蒋是正义，不能以利害定行止。我看还是照原约，你去沈阳走一趟吧。如能使东北加入，则成功希望大些。”我说：“我的意见，义不容隐而不言，至于最后决定，当然是您的事。既然决定继续进行，我就起身赴沈阳，并以迅速为好。”这时已是三月初旬，当我到平、津时，冯已回到防地。阎、冯与蒋系的高级人员互骂电报，已在报端开始披露。当我抵沈时，蒋、阎之间，已经宣告决裂。张学良本来在唐生智事变后，认为蒋的力量加强了，阎的威信降低了，曾对他的亲信说，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。但阎、冯若真停止反蒋，东北对于南京的压力，仍然无法减轻，所以他又不敢说不反蒋。今蒋、阎已经破裂，他乐得不参加，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，只因前有成约，不能简单谢绝。于是他很客气地告诉我，他在东北的处境，非常困难，他不能支配老前辈，而老前辈却可影响他。反蒋之举，需要开一次会，如能说服大家，就可决定云云。他又让张作相、万福麟等人分别与我谈了话。又过两天，他来到我的寓所，很客气地说：“我很抱歉，老者们通不过，经我一再争执，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。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，东北决定中立，但对阎先生，

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。请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。”这就是我赴沈阳的结果，当我返晋时，战事已经开始了。

（七）阎冯反蒋之战的结果

阎冯反蒋之战，为军阀内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。阎、冯有兵六十万，杂牌军队号称二十万，总兵力不下七八十万，而蒋方尚不止此数。出兵之前，阎被推为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，冯为副司令并负责指挥陇海、平汉两路的军队，傅作义指挥津浦路的军队。从三月中旬开火。并由汪精卫等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。无论改组派、西山会议派，凡是反蒋的，一律欢迎。可是经过数月，连组织政府的方案，也没有拿出来。而华北及平津两市对中央的例行公事，都寄到太原阎行营。因此，行营办公处大感困难，急调专业人员来晋处理。一直忙到九月中旬战事结束之时，才告一段落。徒劳而无功，使我精神上大感痛苦，所以下决心，以后不再做政治活动了。当战争之初，刘茂恩在陇海路首先倒戈相向，以致冯军损失甚大，幸而津浦路节节胜利，所以尚未影响全局。但平汉、陇海两路，始终不能进展，亦未始非刘茂恩倒戈之故。当战争正在激烈之际，蒋、阎两方，均在沈阳派有常驻代表，争取张学良加入，而张则依违两可，始终不表示态度。迨至九月间，傅作义在泰安失败后，张学良乃于九月十八日发出巧电，要求阎、冯停止战争，实现和平。一面派军队入关，准备接收平津。阎、冯正在筋疲力竭之际，那堪受此打击，只有全线撤退，听候处理。而蒋介石对阎、冯的要求是，“放下军队，出国游历”。阎则愿意此后不问政治，专心开发西北，办理实业。那时山西尚有军队二十余万，阎仍留晋，蒋介石当然不会放心，所以一再逼阎出国，否则就要围攻山西。阎不得已，又派我和温寿泉赴沈阳，要求张学良从中缓颊。我们到沈后，张学良据此电请蒋介石，而蒋介石的复电，仍是坚不允许。我和温寿泉返晋后，阎

只好筹划离省。本来张学良一再说，阎离晋赴津途中的安全，他负完全责任。他打算特备专车，由大同直送天津，让我们转达阎锡山。但阎不同意，恐为张学良所骗，乃决定乔装赴津。先派秘书王怀奇由河边经大同、丰台坐三等火车赴津，察看沿途情况。返回之次日，即由王秘书陪同阎从原路坐三等车赴津。阎扮一老商人，布鞋布袜，风镜风帽，居然一路无人察觉。到津后，暂住法租界其妹夫寓所。冯玉祥则率一部分军队，退至绥西。而扩大会议的成员，也纷纷四散了。这就是阎、冯大战蒋介石的结果。

（八）阎锡山旅居大连情况

阎离晋到津后，即有不再出国之意，在日租界购买大型房屋一所，将眷属及随员一齐迁入，准备久居。蒋介石闻讯，认为津晋相距咫尺，阎在津在晋，有何区别。张学良亦认为阎如在津，他对晋军更难节制。所以蒋、张二人，都以阎留津为大患。于是蒋发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迅速返晋工作，以揭发阎的罪恶，一面让蓝衣社特务分子在阎的居所附近不时加以窥探，以威胁之。那时，蓝衣社特务可以用种种方法随便杀人，而法庭不加过问，阎在精神上不堪其扰，行动又受此威胁，而张学良又随时派员询问阎的放洋日期。阎乃决定今年先到大连，明年再经由日本赴欧美。

阎锡山既到大连，蒋介石认为大连离晋较远，且在日本警察统治之下，他的特务亦无法活动，所以不再逼迫。阎遂在大连定居下来，不再出国了。阎在大连居住八九个月，在此期间，我能回忆的事不多，原因如下：一到大连，我就和阎说，“在此患难时期，无论到什么地步，我一定相从到底，决不离开，但不再参加活动。一俟您东山再起，我就决心经营实业，不再做政治工作了。我希望您谅解我，允许我。”阎慨然曰，“我了解你，人各有志，你既不愿再参加政治，我决不相强。”可是不久，张作相在他的老家锦州办丧事，阎就派我偕他的儿子阎志宽前往祭奠。

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活动，我一再谢绝，坚不应命，因此大触阎怒。从此以后，他遇事只和赵戴文商量，不再招呼我。我也避不谈有关政治的事了。这就是我在大连回忆材料较少的原因，只有两事可以谈一谈。（1）阎是否预知九一八事变。（2）日本人送阎返晋，有何条件。

一九三一年春夏之间，赵欣伯由沈阳来大连活动过一次。赵是留日学生，日本人的走卒，后来是伪满州国的大臣。他到大连后说，东北三省让张家父子搞得一塌糊涂，人民水深火热，不堪其苦，所以很多人希望阎先生以治晋之方，救救东北。他托人向阎转达此意。阎闻言大惊，急派人主动访赵，经过两日，赵遂悄然返沈。由此推测，可以肯定，赵来大连是日人派来的。至于阎如何表示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只听阎在事后说，此种人，远不得，近不得，见了面，就麻烦了。其弦外之音，可以想见他应付之妙。质言之，可能是以积极反蒋为词，而婉谢赵劝阎救东北的含意吧。随后，民航局局长（少校阶级）来说，欢迎阎离的人坐他的飞机在大连上空游览。又过些时，阎派人向民航局接洽，出大价（约合美金三四万元）包得仅坐四五人的小飞机一架，由这位局长亲自驾驶，于八月间把阎送到山西大同。听说飞机离海岸后，迷失方向，盘旋许久，才找到平绥铁路，沿铁路飞行，到大同时，油将告罄，也就险了。阎性吝啬而胆小，此次出重价，冒险回晋，事如不急，阎必不肯。以此推断，阎必预知东北将发生事变。而日本人送他回晋，据事后所闻，其唯一条件，是发动反蒋战事。阎回晋后，我由大连乘船回到北平。因为要实现我离开政界的愿望，我没有回晋，直到一九三二年春季，我才被聘为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的经理，实现了我的计划。当我一九三一年在北平时，听某人（此人与日本人有较深的关系，后来竟沦为汉奸）说，阎把日本人骗了，原说他回晋后，就发动反蒋战事，结果至今尚无举动。其实阎回晋后，根本无力发动战事。当时，蒋闻阎

已归晋，急电令张学良和徐永昌（山西省政府主席）限期令阎离晋。但张学良无能为力，徐永昌曲予庇护。拖延一月以后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已发生，阎更无离晋之意了。然蒋并不因此放松逼阎，一再责成徐永昌驱阎离晋。最后派魏道明到北平与徐永昌协商驱阎办法。据徐永昌事后对我说，这次谈判，他很坚决。他告魏道明说：“阎不离晋，我实在无法驱逐他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他仍回大连，谁能担保他不再回来？现在日本侵华日急，我们应该团结国内力量，共同抵抗，岂可再为渊驱鱼？”徐说大概这是最后一次，可能不再逼迫。果然延至一九三二年春，就任命阎为太原绥靖主任。我这篇回忆录，也就止于此了。

（本文作者一九三一年以前名汝舟，字巨川，当时是阎锡山的交际处处长，行营办公处处长。）

对《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》的订正

（一）《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》唐生智通电反蒋和阎锡山拥蒋一节，说“唐生智（代表姓名不记得了）”，又说：“唐生智通电之前，并未向阎取联系。”对此，我了解的情况是：当阎失败后，赵丕廉先生准备到天津的时候，我因师生之谊，前去送他，他正在写日记，我记得他日记的内容大意是这样：唐生智派代表袁华选（字士权），见阎商洽反蒋，阎派赵丕廉为代表前往郑州见唐，行前由赵与王朝俊（字鸿一）、李泰莱（字革痴）替唐拟好反蒋电稿，经阎核阅。赵到郑州后，唐已发出“冬”电（十二月二日）自称护党救国军五路总司令，拥戴汪精卫，于是将太原原拟定之稿倒填日期补发“东”电（十二月一日）。东电内容是阎当时所宣称“国事由国人解决”的主张。可见阎对唐反蒋曾予支持，惟不满意他拥汪，后来讨唐这应该是原因之一。阎对部属，只让他们各管各，由他自己总其成。和唐的接洽，梁航标先

生不一定知道。

(二)关于冯玉祥来晋后的住址问题。《蒋阎关系》一文说：“暂驻于五台建安村”，又说：“软禁在五台西会村”。为使阅者明白当时具体情况起见，现将冯来晋的住所和迁移情况排列如下：冯初来晋，住晋祠江叔海花园，十月间移住西会村，西会住了一二天，移住建安村。次年二月末，阎蒋交恶，始来太原住在傅公祠，三月八日夜由太原起程回潼关。反蒋失败后，《蒋阎关系》一文说：“冯玉祥则率一部分军队，退至绥西。”按冯失败后，初住汾阳峪道河，次年住晋南，因为这一带都是部下宋哲元的防地。

郝树侯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

(本文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)

关于蒋阎冯中原混战的几段回忆

于镇河的回忆

一九三〇年我任第八军（军长张会诏）第二十四师师长时参加了蒋阎冯中原混战。四月间第二十四师随第八军军部开驻河南彰德一带，第二十三师（师长周原健）开新乡一带。六月间第八军奉命全部向山东东阿附近集中，准备先渡过黄河占领东阿后，再向济南挺进。当二十四师先头的一个团（七十一团）将河南岸马鸿逵部的骑兵两个连击退，渡过黄河到达东阿时，阎锡山命二十四师除留东阿七十一团外，其余全部星夜开回彰德，转乘火车开往陇海路开封以东罗王车站，归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指挥。到罗王后，旋即奉命开兰封，归陇海线左翼总指挥孙楚指挥。当我师到达的夜间，所有前线军队正准备开始总攻击，我师奉命担任总预备队，位置于兰封附近。但总攻击未奏功效。右翼杨固集方面，杨效欧所属军队遭蒋军反击，情况紧急。第二十四师奉命派遣第七十二团增援，战局始告稳定。师部和第七十团仍留兰封，参加对内黄车站蒋军的进攻，亦未奏效。随后又奉命与骑四师（师长彭毓斌）共同开到兰封东北司楼附近，归石友三统一指挥，向考城蒋军进攻，牵制住蒋军范熙绩部，使石部能按时迂回。但因石部被蒋军夹攻，受到损失，即撤回原防。二十四师随又调至赵坡楼附近，接替冯玉祥部一旅的防区，归杨效欧指挥，向蒋军第六师赵观涛部连攻三次未能成功，形成对峙状态。相持两月后，因津浦路战况不利，张学良由东北进关，石友三、吉鸿